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区域联动开创协调发展发展新局面

丁茂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呈现新气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并对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不断释放聚合效应,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联动发展关乎全局决定长远

所谓“联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连接,更是要素、产业、制度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区域联动发展关乎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关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关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行战略谋划。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还比较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内需潜力释放,而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强化区域联动发展,有助于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打破孤岛效应,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打通断点堵点卡点,畅通经济循环。当前,区域间市场分割、物流成本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1%,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作,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大国竞争日益表现为区域之间的综合较量。我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就必须打造若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区域增长极。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正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建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这有利于通过中心辐射、以点带面,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经络”,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

现实矛盾和挑战仍待破解

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联动机制不断健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但还要看到,制约区域联动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障碍仍未根本消除,亟须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协调。

从发展成效看,区域联动的基础条件显著改善。我国高铁营业里程突破4.8万公里,覆盖97%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90%,覆盖超80%的县,服务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截至10月末,全国5G基站总数达475.8万个,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内产业协作日益紧密。川渝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区域联动发展已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局部探索迈向系统推进。

区域联动发展涉及多方调整,还有一些现实矛盾和挑战亟待破解。一方面,行政区划壁垒制约联动发展。当前,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标准不一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跨区域合作停留在框架协议层面,缺乏实质性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有的城市群内城市之间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但在重大项目布局、标准执行、人才认定等方面仍存在“各吹各号、各唱各调”现象。一些企业反映在跨省经营中面临资质互认难、政策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好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支撑带动作用。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间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兑现慢等问题。这些不仅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也削弱了区域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仍显滞后。现行土地、财政、生态补偿等政策多以行政区为单元设计,难以满足跨区域治理需求。流域经济、飞地经济等新模式虽有探索,但缺乏顶层设计和法治保障。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虽在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等方面取得突破,但其经验尚未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在实践中,仍需加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联动从物理连接转向化学融合,实现制度协同、政策协同、行动协同。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突出重点

《建议》为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清晰路线图,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协作机制、培育联动载体,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以大通道建设夯实联动基础,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支撑区域联动发展的“骨骼”。《建议》明确提出,“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应聚焦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领域,坚持“硬联通”与“软联通”并重,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交通方面,加快推进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贯通,打造城市群、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进算力互联互通,实现跨区域算力资源部署和统一调度,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标准统一与管理协同,如统一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港口通关流程等,真正实现无缝衔接。

以城市群为重要载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城市群是区域联动的主要形态。《建议》提出,“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应聚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建立跨区域产业链图谱与区域创新地图,引导各地差异化布局、协同发展。例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可依托武汉光电子、长沙工程机械、南昌航空制造等优势,共建先进制造业集群,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共建实验室、中试基地,促进跨区域科技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激发“1+1>2”的聚合效应。

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机制。各地应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着力推动协同发展。创新毗邻合作、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新模式,推广深汕特别合作区、苏宿工业园区等成功经验,探索建立GDP分计、税收分成、能耗指标置换等制度。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促进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明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责边界,为跨区域合作提供法治保障。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既是空间重构的过程,更是制度重塑、动能再造的系统工程。这要求打破“行政区经济”束缚,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形成全国“一盘棋”。唯有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相融合,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统一,方能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6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数字金融是优化金融服务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领域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金融机构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需推动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延伸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数字金融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用于金融行业,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有助于打破传统金融信息壁垒、拓展服务边界,让资金更精准、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缓解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传统金融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机构无法准确评估企业和个人信用风险,对抵押物有一定的依赖性,融资门槛较高。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深度挖掘数据构建多维度信用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全面准确的客户信息,助力其精准把握企业有效需求和潜在风险,引导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融资结构的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可以快速精准匹配实体项目与金融资源,提升服务普惠性与渗透率,降低资金空转风险,提高融资效率。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末,银行机构通过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累计发放贷款37.3万亿元,有力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有效避免金融资源错配。传统金融模式服务小微企业风险高、成本高,支持小微企业意愿不足,导致信贷资源过度向大企业集中,形成规模错配问题。数字金融的灵活性和创新模式,能够有效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精准性,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例如,微众银行推出线上无抵押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微业贷”,授信企业中,年营业收入10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占比超70%。同时,传统金融模式依赖历史财务数据和抵押物,难以评估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的创新价值,更倾向于服务成熟期传统企业,导致资金无法有效流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领域错配问题。数字金融可以有效评估企业风险、信用与发展潜力,能够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有助于满足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毛锦凤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涵养优良作风

李俊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今年3月以来,全党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和补齐作风建设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面向“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中央八项规定成为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

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形成管党治党新气象。制定中央八项规定,不加“试行”两字,表明坚决的态度,体现规定是刚性的。出台中央八项规定,旨在立明规则,破潜规则,通过对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明确细致规定,强化制度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严厉整治“四风”和隐形变异问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35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729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0761人,凸显“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管党治党决心。

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密切党群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政治上认识和对待作风问题,在践行初心使命上坚持最高标准、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上坚守最严要求,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各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全党上下齐抓作风建

设。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教育了干部、赢得了民心、改变了中国。2024年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显示,对党中央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表示满意、总体成效表示肯定的,分别为97.4%、94.9%。

整治“四风”突出问题,开辟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作风问题纷繁复杂,针对“四风”顽疾,抓住主要矛盾,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形成有效举措,实现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坚持标本兼治,对于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巡视巡察和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既教育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也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纠治不正之风,把党员管理、干部监督融入日常、化为经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通过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理想信念,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增强拒腐防变能力;通过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对症下药

作风建设是一项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13年,中央纪委连续146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党员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罔顾规定、顶风违纪,“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易发多发,必须一严到底、寸步不让,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首先要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行动上的偏差,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比如,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认识存在误区,于是出现应景、表表态,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认识,必须坚决纠正,否则就难以把工作落实到位。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一再证明,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刀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数据看,查处问题类型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二是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在查处级别上,乡科级及以下干部占比约九成。这说明,基层政治生态需要进一步净化。“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隐形变异,要求作风建设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不断巡堤检修、培土加固。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不正之风多源于特权思想,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何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增强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意识,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是把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这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如何实现授权用权机制相统一、体制机制清晰透明可追溯,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如何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防范化解“腐蚀”“围猎”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这也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风’问题具有

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夯实思想认识基础,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

强化党性修养。不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养成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好习惯,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入查找党性党风党纪上的差距不足,自觉纠正和克服各种思想偏差。加强理论武装,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对照正反面典型进行自我省察,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从严监督执纪。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用好“从严监督执纪”这件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在从严监督上,要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提高党组织日常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向全党释放一严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生性根源,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作风建设是全党的共同责任,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各责任主体明责知责、履责尽责,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健全结果运用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严到底。健全完善“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明确责任边界,让基层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具体事做起,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版编辑 秦悦美 编倪梦婷